

第二轮修志的实践检视与进路思考

——以浙江市县志书编纂为例*

徐 鹏

提 要：第二轮修志期间，浙江各市、县（市、区）推动地方志工作走上制度化轨道，围绕修志流程的整体认知和具体环节的规范把控凝聚共识，各地志书记录、展示浙江人民取得的改革发展重大成就，在体例创新和主题表达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和做法，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浙江方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面向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地方志仍缺乏与社会群体同编共读的有效机制，尚未真正步入数字修志的实践阶段，还需进一步培育宏大叙事框架下的民生意识与性别关怀。第三轮修志要在第二轮的基础上再出发，以党和政府、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标注事业发展新高度。

关键词：浙江市县志书 第二轮修志 建章立制 流程规范 志书品质

经过社会主义时期两轮修志，绵延千载的方志文脉实现了在当代的赓续和开新。面向新时代，要更好地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进一步提升地方志的核心辨识度，需要及时回望来路，把第二轮“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到规律性的理论认识上来”^①。就管见所及，此前探讨第二轮修志的文章，主要从撰修方法的继承创新、事业发展的对策研判、特定志书和专题的案例剖析以及编纂心得的总结提炼等角度展开论述，对于一省修志的全过程回顾和结构化评估尚付阙如。缘此，本文就浙江市县第二轮修志历程略陈浅见，以就教于兄弟省市和海内外方家。

浙江市县第二轮修志于2001年12月正式启动，2020年底全面完成，前后历时20年。2021年下半年，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印发通知，以问卷形式对列入第二轮规划的98个市、县（市、区）进行调查统计，内容包括机构人员、主编团队、体例篇目、出版信息、修志经费、流程管理、修志时长、组稿方式、工作文件、志书特色、经验教训、数字化建设、学术研究、转化应用、方志传播等十余个方面。本文基于回收的98份问卷进行归纳分析，排除各项指标的干扰因素，确定有效数据样本，尝试跳出此前从操作实务角度讨论志书编纂应采用plan A或plan B的定式，尽可能关注20年历程在整个浙江地方志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价值，对全省市县修志工作的总体得失进行量化分析和系统考察。^②

从结果来看，第二轮修志期间浙江省共编纂完成11部市志和87部县级志书，记述时限最早上溯至事物发端，最晚下迄2018年，时间跨度7000余年，总计约3.1亿字，继承、夯实了首轮成果乃至历代修志传统，制度化之路愈益坚实，编修流程的认知把控渐趋规范，“浙江故事”的讲述方式不断丰富。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已经拉开序幕，今后10年20年是决胜中国梦、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第三轮修志如何汲古出新，找准定位，更好地将志书所述与时代所需结合起来，需要方志同仁共同思考和面对。

* 本文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开展的全省市县第二轮修志调查统计工作阶段性成果。

① 刘玉宏：《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经验、问题及对策》，《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② 本文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21年11月。

一 事业基石：建章立制与巩固拓展

方志于宋代定型之后，逐步确立官修地位，悬诸朝廷功令，形成相对固定严谨的纂修规程，有别于私撰性质的稗官野记。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务院于1958年颁发《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重启政府修志工作，然受运动风潮干扰，未形成较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在两轮大规模修志过程中，新时期方志事业的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并完善。

浙江市县首轮修志，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第一次全省范围内大规模编修地方志书，虽初步划定“五级政权、三级修志”的事业界限，明确“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但全社会对于地方志作为政府行政职责的认识还不到位，落实依法修志的条件尚不成熟。“三级修志”的表述本身亦欠周全，全省首轮80部市县志书中，城区志被排除在外（见图1），客观影响了地方志工作行政化、制度化的走势。且事业初创，很多地区的修志工作由有识之士呼吁发起，实际依靠主编团队的热忱和个人影响力来推动，反而淡化了“官志官修”的职责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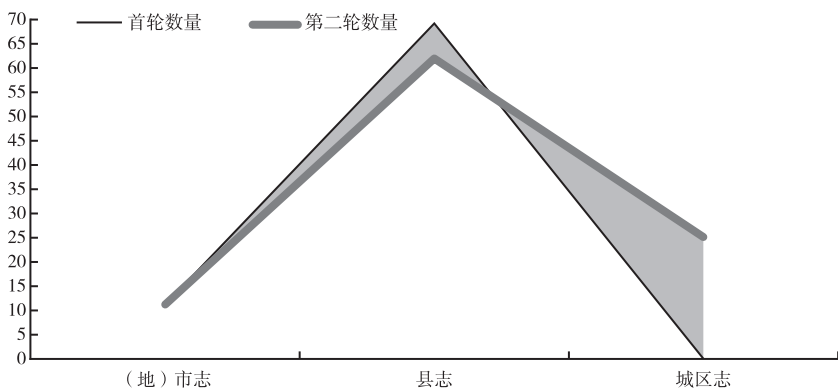


图1 浙江省两轮修志（地）市、县、城区志数量对比

第二轮修志期间，首轮构设的框架得到修正和完善。2006年5月18日《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行是重大契机，浙江省内各市、县（市、区）通过学习贯彻《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志书编纂任务纳入地方政府工作规划、计划和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范围。2006年5月至2020年底，浙江省三级党委、政府共印发30份地方志工作规范性文件。^① 这些文件明确了地方志的职责属性、事业内容、目标任务、组织形式、领导机制、机构队伍、保障措施等内容，落实依法修志，为推进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从时间上看，2012年后印发文件数量较之前多出两倍有余（见图2），制度化趋势持续增强。在此基础上，约19%的市县修志任务列入当地政府五年规划纲要、年度工作计划、年度重点工作、部门街道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以及督查项目，这一比例在浙江省第二轮修志创优工程试点单位^②中更是达到61%。此外，约46%的市县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出席修志工作会议，部署修志任务。

① 不含具体部署志书、年鉴以及方志馆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文件。

② 试点工作于2007年启动，在县级行政区域中首批评选产生14家，2010年增选至18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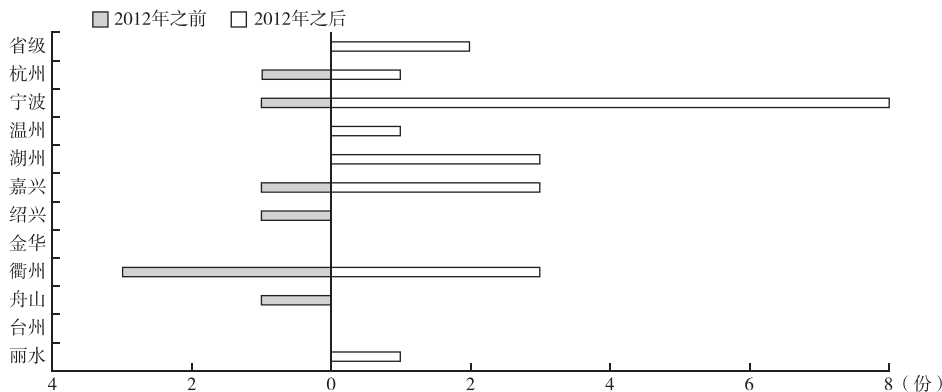


图2 浙江省2012年前后印发地方志规范性文件数量

随着党委、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组织领导的加强，浙江市县修志经费得到有效保障，拨付使用趋于制度化和规范化。依据实际开支情况，可将市县修志经费大致分为行政经费、专项编纂经费、课题研究经费和出版经费4类，行政经费额度主要在100万~200万元之间，课题研究经费为50万元左右，专项编纂经费和出版经费分别在200万元以内。^①

业务指导论证机制也更趋完备，在形式上，表现为省、市、县三级指导，工作的内容、方法、具体程序以及专家配备趋于明晰。浙江的三级指导以对口联系人、省地方志专家委员会和市级修志专家库制度并行：对口联系人，由省地方志办公室专家分工负责11个市域内志书的编纂指导和评审论证；省地方志专家委员会，聘请有关部门领导专家、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分组、定点参与相关市县志书的指导和评审工作，提供理论和技术上的支持，对口联系人和省地方志专家委员会成员全程参与市县修志，确保业务规范要求具体落实到每一部志书的编纂实践当中；市级修志专家库，由各市地方志工作机构自行组建，汇聚当地业务骨干以备取资，作为对口联系人和省地方志专家委员会的有益补充。

在内容上，主要针对篇目和志稿进行评议。重视篇目论证是浙江市县修志的一大特色。篇目论证，主要审议修志凡例、志书体裁和篇目结构。20年间，绝大多数市县在修志之初都注意认真打磨篇目，反复论证，避免轻率立意设篇、仓促转入资料搜集和分纂阶段，尽可能将初稿撰写以及后期总纂修改中可能出现的内容与框架方枘圆凿等问题消弭于未萌。开展初审、复审以及终审工作则是各市、县（市、区）的通例。志书三审程序，初审以本级地方志编委会为主体组织开展。县级志书复审，由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开展；市级志书复审，由省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开展；省第二轮修志创优工程试点单位志书复审，由省、市两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联合组织开展。终审由本级人民政府组织开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浙江省市、县（市、区）地方志书审查验收和出版管理办法》（浙地办〔2013〕20号）是第二轮修志期间各地共同参照执行的标准。

二 修志流程：基本环节与规范把控

我国素有官修史志的传统，在人事职司、编修程序以及质量把控上均有可循之矩。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新志编纂范式在传统与时代的碰撞交融中逐步调适、完善。首轮修志收尾之际，魏桥

^① 经费列支受时间、地域、物价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本数据仅供参考。

指出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些规范性的做法”，但是“尚没有统一的模式，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反复比较，以期有一个适合自己的较佳模式”^①。浙江的第二轮修志经验显示，经过20年“不断创新”和“反复比较”，市县修志的“浙江模式”有了较为清晰的整体呈现，各地在修志基本环节的认知以及规范和把控上形成了相对共识。

（一）人才队伍

第二轮修志初期，浙江全省人才相对紧张，2007年，98家市县地方志工作机构在职骨干只有300余人，志书编纂往往需要聘请退休干部或地方文化界人士，人员整体年龄偏大。至2018年，在职骨干已近600人，较前增长近一倍，志稿总纂的任务大量移至专职在编人员肩上，队伍年龄结构明显优化。

同时，编纂团队的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有所提升。市县第二轮志书的业务主编^②中，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占46%，副高以上职称的占22%。各地潜心修志之余，还积极开展编纂业务和历史文化研究，学术关怀已沉淀为浙江方志人的一种内在品格。据不完全统计，20年内，98个市、县（市、区）出版方志理论和地情研究著作近千种，在《中国地方志》发表论文45篇，在《浙江方志》发表论文400余篇，其他报刊杂志上也有大量文章见载。

（二）修志时长

浙江市县修志流程可简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承编单位撰稿阶段，二是志书编辑部统稿阶段，三是志稿评审出版阶段。经对各地数据的核算^③，单部志书从启动到出版，大约需要8年7个月。其中，第一阶段4年，第二阶段1年9个月，第三阶段2年10个月。第三阶段中，志稿三审程序，大体为1年10个月；完成出版印刷，约需1年时间。^④整体进度则如图3所示，全省市县第二轮修志自2013年进入出版高峰期，该年后出版志书占全部志书的74%。因此，就浙江而言，市县志书的编纂周期约为10年，但从两轮修志的间隔时间来看，则仍以《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的“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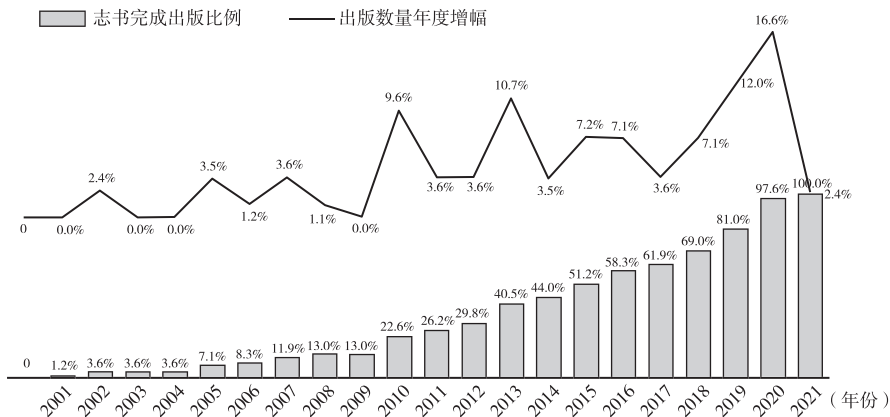


图3 浙江市县第二轮志书出版数量历年增幅

① 参见魏桥：《两轮修志说》，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② 通常称为执行主编、常务副主编、总纂或主笔，主持志书编纂业务。

③ 不同修志阶段时长的测算结果，来自于各阶段数量不等的有效样本数据。

④ 考虑数据的有效性，以2016—2021年内正式出版且提供有效出版流程数据的地区为样本进行计算。

（三）流程规范

宏观指导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指组字〔2008〕3号）是各地共同遵循的标准和指南；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印发的《浙江省地方志行文规范》和《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做好全省第二轮志书编纂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志书编写的总体规范，尤其是对如何记述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特色提出指导意见。具体实践上，如表1所示，各地针对修志相关环节，特别是从志书编辑部工作的角度总结出一套在省内应用较为广泛的规范性细则。

表1 浙江市县第二轮修志各阶段常用规范性文件情况表

修志文件 修志阶段	文件性质	文件内容
启动阶段	修志启动文件	开展修志工作，调整或成立编委会，确定主编团队，成立修志编辑部
	修志工作方案	总体目标与编纂计划，编纂进度分解表，志书凡例与纲目，承编单位任务分解表，资料征编基本要素与质量规范，入志大事记、人物、图照的征集要求和标准，资料长编编写规范，资料归档要求
	修志考核办法	承编部门责任书，修志工作纳入政府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意见征集	志书纲目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征集修志资料的通知
	修志培训	培训工作安排，培训手册
编纂阶段	资料长编	资料长编评审标准，资料长编规范补充意见，培训工作安排
	部门初稿	部门初稿编写及修改要求，行文规范，撰稿交流协调会材料，部门初稿评审标准，培训工作安排
	总纂	总纂工作方案，总纂编校规范，编辑部内部交流协调会材料，专项资料验收入志标准
	督查	成立督查组，督查目标及督查工作安排
评审阶段	三审程序	编辑部内部审稿规定，质量评审标准，专家评审组名单，志稿送审程序，志稿修改进度安排

（四）分纂撰稿

第二轮修志期间，志书分纂的一般做法是由承编部门负责原始资料搜集、长编和初稿撰写，志书编辑部较少参与初期的撰稿事务。但在调查中发现，浙江部分市县的选择与此认知有

一定出入，排除各地数据填报可能存在的指向偏差，市县地方志工作机构在分纂稿阶段参与撰写或修改的比例仍达到30%~40%，反映出基层修志的实际取向。此次调查问卷设有“修志经验教训”的专题栏目，不少地区在反馈中都提出了全程参与志稿编撰的设想，可与上述实践相印证。

（五）志书出版

浙江市县第二轮志书的出版发行单位，省外多选择方志出版社、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省内则以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浙江古籍出版社为主，其中方志出版社中标率最高，约占35%。此外，对20年内的志书价位进行考察，可见其逐年上升趋势，以2016—2021年正式出版的49部市县志书为例，平均每100万字市场定价约244元。^①

三 志书品质：体例创新与时代刻画

地方志书一般以当时所处社会为重点记述对象，怎样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受众同向而行，成为历代修志常编常新、阐之不尽的命题。在旧志中，主要构建考辨沿革、赞论人文的士大夫价值关怀，而社会主义时期的方志编纂则以新的历史内涵进行标注。

首轮修志期间，如何在因循中自立经纬，引起浙江修志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从外部来讲，自主创新是首轮修志的时代要求；就内在而言，各具别裁在实践当中成为全省市县的自觉选择。魏桥在首轮修志之后将这种自觉总结为“突破框框，大胆创新”^②。第二轮修志期间，求真务实、鼓励创新得到进一步的接续和阐扬，各地不约而同地注目于志书的体例创新与主题表达。

（一）确立中小编体的篇目范式

市县志书的篇目设置在首轮到第二轮之间有所调整。首轮规划80部市县志书（市级11部、县级69部），平均每部所设约30编，部分志书所设不过20编左右，一般的做法是在1980年代初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新编县志基本篇目》的大编体框架下，取消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等第一层级门类，将原第二层级门类整理融合后，提升为一级类目。

第二轮志书在此基础上，于学科分类和部门职能分工之间斟酌损益，进一步拓展为贴切、灵活的中小编体。其中，市级志书平均设56编，县级志书平均设42编^③，类目更多，覆盖面更广，承载能力更强，设置更科学，具体表现为：11个设区的市（见图4），金华、台州、丽水3市为通志，平均1部设49编279章，543万字。8部续志里有6部中小编体，平均1部设56编348章，689万字。^④

县级志书中27部通志，以40编左右居多，体量最大的《象山县志》设53编，613.5万字；体量最小的《黄岩志》设21编，100万字。平均1部县级通志设44编231章，370万字；60部续志所设编数主要集中在38~50编之间。体量最大的《萧山市志》设45编170章，1005万字；体量最小的《衢县志》设27编，80万字。平均1部县级续志设41编187章，254万字。

① 志书定价，除与文字量有关外，还要综合考虑史料价值、智力成本、装帧设计、纸张印数、地图图照的使用等事项，这里计算的均价仅供参考。

② 魏桥：《两轮修志说》，第47页。

③ 本文所统计的编数不含志首的概述、大事记，但将志末的人物传、丛录（或称杂录、杂记、文献附录等）计算在内。

④ 衢州、舟山两市为大编体不作比较。又，由于杭州、宁波、温州三市志书体量较大，导致续志平均编章数和文字量反在通志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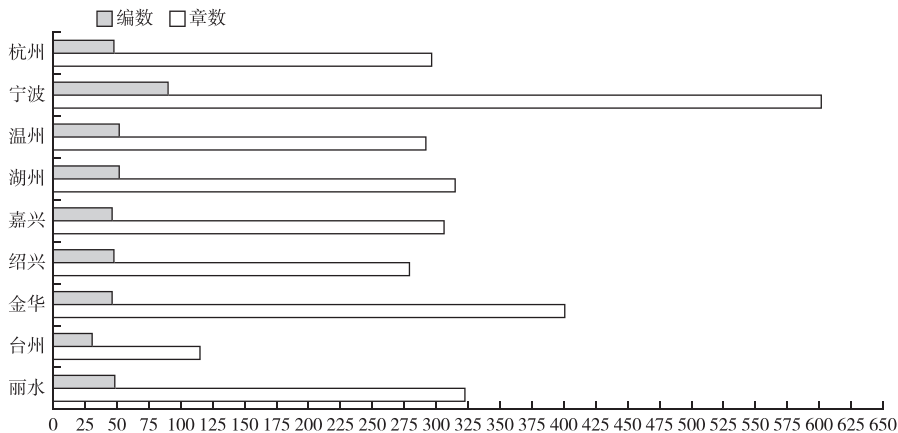


图4 浙江省9部市级志书编章设置对照图

（二）记录改革开放发展成就

统计显示，浙江市县第二轮志书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20年发展历程进行了重点描绘，其中30部通志的下限主要为21世纪前10年，68部续志的断限集中在1980年代后期到2010年代，全程聚焦浙江人民在历届党委、政府领导下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是为浙江发展的重大事件留影。红船精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扶贫小康等时代主题，借由方志书写载入浙江记忆；以乡镇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开发区、良渚文化、温州模式、小商品市场、华侨之乡等为主题的专编^①、专记大量出现在志书中。其中，“生态环境保护”编^②的设置率高达91%，成为浙江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的生动写照。全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奋斗历程得到系统展示，接轨上海、新型工业化、城乡一体化、海洋经济、路网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住房改善等举措均有详尽记录。各地还普遍注意到改革开放事业中的政策引领，约57%的志书专设“施政纪要”（又称“施政纪略”“施政要录”“政事纪要”）编或章，记述党委、政府的良策善政。“施政纪要”大体分为时序记述与分类记述两种，或按政府任期次序梳理历届要政，或依据主要政务分门别类进行记述，后者使用频率较高。第二轮修志在改进此前对社会、文化领域关注相对不足的同时，仍然延续了首轮突出浙江经济大省地位的做法，经济、工业门类的记述比重从17%到44%不等，平均约为28.6%；特别是市县志书中设“经济体制改革”编者达到64%以上^③，部分专设“改革开放”或“开放”编，经济、工业领域的成就和影响力得到相对集中的展现。

二是为改革开放的民生体验留声。首轮修志引发的民生问题的讨论在第二轮中有了进一步阐发。各地注意传递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幸福感，对衣着穿搭风尚、通信工具变化、民营寄递行业兴起以及“菜篮子”工程等内容的刻画不吝笔墨，赋予志书以民生“温度”。浙江的统计数据显示，第二轮修志中设置“居民生活”（或称“人民生活”“社会生活”）编者占

① 指将志书中原属第二层级的“章”提升为一级“编”进行记述，即通常所讲“升格”的一种。

② 该编在各部志书中名称并不一致，又有“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县建设”等称谓。本文统称“生态环境保护”。

③ 不同志书的设置差异明显、称谓有别，有些志书分设“经济总情”编和“经济体制改革”编，有些志书将两编混一，有些志书则分别设立“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编等。本文统称“经济体制改革”编。

到54%，该编主要记述城乡居民收入、居民消费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家庭财产、婚姻生活等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内容。这些记载部分依靠政府部门数据，部分源于非官方文献记录。统计还显示，20年来修志者对社会调查报告的采用率也有所提升，一些志书将相关调查成果列入正文撰述或载入附录、丛录，拓宽了向下关注人民群众生活状态的记述视野，提高了文本的资料性与可读性。

四 写在新时代：第三轮修志如何再出发

检视浙江市县修志历程不难看出，第二轮修志虽然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然而诸方面的新旧问题也进一步暴露出来：方志工作的触达面和影响力较首轮有了明显提升，但在赢取社会广泛认知和参与方面仍存短板；修志者致力描画时代全景、挖掘记述纵深，但对历史进程中具体人与人的活动内容关注度仍有不足；当今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已贯穿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地方志尚处于数字化的起步阶段，与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还有一定距离。第三轮修志期间如何以志书编纂牵引方志工作整体跃升？怎样增进地方志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契合度，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这都需要我们结合第二轮的思考探寻新方向，开辟新场景。

（一）擘画开门修志方案

第二轮修志期间，浙江部分地区尝试延伸读志、用志轴线，探索修志工作与地方社会发展交互融通的有效途径，在市县志书整体付梓后不久，省内就涌现出一批修志成果转化应用的典型案例。^①透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到目前地方志书主要在资政服务、文旅开发、名优特产发掘和文化展陈活动中发挥基础文献作用。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是覆盖面较窄，对于公众的辐射力相对较弱。其中固然有自身宣传推广的问题，但地方志作为一项公益性文化事业，对公众的接受和阅读认识不到位，缺乏与社会力量共建共享的有效机制，显然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定义，公共文化服务“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应遵循“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则。第三轮修志期间，要切实扩大、深化地方志的社会影响，还需在开门修志、引导全社会同编共读上做文章。

一方面，方志编修作为我国悠久的史学传统，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人文科学，秉笔者多系地方文化名流。而传统用志群体也往往以人文社科研究者为主，这在无形中加固了专业界画，导致今天仍有不少人抱定修志是史家“当行本色”的观念，其他学科特别是理工科背景的人才在方志界难觅踪影。修志主体的单一必然带来志书编纂的主观偏向。很多志书可以在文化和社会部类记述上不断提供价值增量，对文史领域之外的内容建设却似缺少考量，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地方志传播和应用的范围。

根据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中国产业发展报告——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转型升级与未来趋势》，以理工科为背景的行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第三轮修志工作，需要把握时代变化，主动吸纳更多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年轻人才加入修志队伍，以复合交叉的跨学科视野观照当下、记载当代，全方位提升志书的价值关怀，让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社科界共同谱写方志乐章，吸引更多领域从业者对志书编修进行关注和思考，主动从中寻找他们的身

^① 参见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关于公布全省市县地方志成果转化应用“十佳”典型案例和优秀案例的通知》（浙地办〔2022〕1号），2022年1月10日。

影和坐标，为促进社会各界享读志书、运用志书提供更多可能。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志书由政府主持编修，代表官方意识形态，以政治性和严谨性为标识，民间社会力量较少介入修志工作。浙江的经验提示，第二轮修志后期，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途径更为多元，由于文化消费氛围的烘托和各类通信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的助推，公众关心、学习、研究传统历史文化的热情日渐高涨。一些地方史研究人员、地方文史爱好者主动参与修志活动，他们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的声音，展现出与官方记述不同面向的历史兴趣和问题意识。如果能营造一种相对开放的修志环境，将民间视角带入方志编修，或可以在旧体制与新思维的碰撞中觅得前行方向。这方面，温州市龙湾区做了先行先试的探索，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牵头成立一系列地情主题民间研究会，聚拢热心乡土的各界人士进入修志场域，引导他们以项目研究、文稿撰写、主题沙龙等形式共同参与区志编纂，对树立开门修志的思维颇具启示意义。

此外，近年来很多高校团队开辟或加强了地方志专题的研究，陆续承接一些地区或部门的修志项目。同时，文化类社会组织参与修志的情况也明显增多，这都表明，无论是政府购买文化服务还是基层修志需求，均存在较大市场空间。尽管其中存在准入门槛低、编纂质量参差不齐和委托代理责任跟踪困难等问题，但在地方志工作机构、承编部门之外出现第三方修志力量，已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以浙江的现有经验来看，当前修志项目外包更适用于乡镇村志和专业志编纂。自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深植乡土的地方志在传承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引起各界重视。然而，基层和相关行业部门缺乏专门修志机构和专业修志人才，短时间内难以胜任修志任务。因此，第三轮修志当中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尝试设置资格审核和动态进出机制，加强与高校团队、文化类社会组织的对接协作，将深沉浓郁的乡梓情怀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文化作品，不失为一种合作共赢的选择。

（二）构建数字修志场景

第二轮修志期间，浙江各市、县（市、区）以志书编纂为引领，推进数字化工作，部分地区建立方志数据库，将旧志、新修志书、年鉴和地情资料从纸质文献转换为电子文本，宁波、金华、萧山、临等地已通过网站或微信公众号提供在线阅读服务，宁波、温州等地还开发在线编纂系统推进修志工作。总体而言，一些地区虽在数字化进程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已建立的数据库中，部分只支持图片格式的浏览而无法查阅，多数不具备系统检索功能。虽然文献检校较传统方式更为便捷，但没有真正激发数字化全方位提升志书品质的潜能，数字修志的美好愿景落地尚需时日。

其一，从“数字”到“数据”。通常所讲的数字化是将纸质的志鉴和地情文献转换为电子文本，以及对地方志业务的数据化记录，通过交互方案的优化，彰显地方志的公益属性，促进社会公众共享共读。随着数字文献的丰富和积累，还可以构筑各地的方志典藏数据库，为之后的修志工作提供资料支撑。但此类数据库往往缺乏完善的菜单和检索功能，遑论植入专门的分析工具支持文本挖掘，实现数字文献的再加工。

随着数字技术与人文社科研究相融合，文本挖掘已成为海内外历史文献整理领域的热点话题。借助计算机重组文献内容，将数字文献的利用方式从“阅读”转向“分析”，比如通过数据分析工具对数据库进行定制主题检索和跨文本检索比较，开展史料归类、编年，计算主题词频，制作历史人物关系网和行迹图，统计历史事件空间场景关联度，建立古今地理时空对位系统等。从国内相关成果来看，数据分析在地方文献和民间史料整理方面贡献巨大，可以预见这些技术手段也将在志书编纂中发挥重要作用。依赖人力对有限入志资料进行简单归纳整理的传统编修模式

或将逐步让渡于运用计算机技术对海量数据文献的“远读”，立足数据分析的新型志书或将具备更立体的文本表达和更深沉的价值关怀。

其二，从“自给”到“协同”。资料性是地方志书的生命线。在浙江市县第二轮修志过程中，部分承编单位提供的各类工作总结和数据报表仅够支持事业发展的轮廓勾勒，倘若遇到机构划转撤并，则可能连基础档案都难觅踪影。可见，这种完全仰赖政府单向“输出”的做法有其“短板”。那么，如何拓宽资料供给渠道，化解资料短缺“顽疾”，当下的数字化改革或是一次契机。

就浙江而言，全省数字化改革提出构建部门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和跨部门数字协同两大发展场景，作为数字文化系统的一部分，两大场景亦是地方志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和方向。围绕一体化集成，省地方志办公室主持开发的“浙江数字方志一体化平台”和“浙里有志”应用，先后被列入省数字文化系统重点应用培育对象和省重大改革（重大应用）一本账，两个平台分别着眼于方志数据归集共享和修志窗口智能化，通过对全省方志资源的集聚整合，以实现较此前更加多维、充分的资料储备。落实跨部门协同，地方志工作要积极“出圈”，谋划与高校研究机构、资源规划、党史、档案、统计、文旅、文博以及各类企业、行业学会协会等部门数据资源的渠道整合和数字化应用的平台共建，以期实现要素资源的一网通览和跨库利用，打造多跨共享的修志数据体系，实现部门修志文本、影像和实物资料在档案馆、博物馆的同步登录存藏，开创志书编纂多点采集、深度加工、规范存储的新局面。

不仅如此，数字化转型也为志书编纂向“全民修志”延伸提供更多空间和可能性。地方志工作机构可尝试开发线上征集和审读平台，向社会提供撰稿权限，支持所有人在线注册、投送个性化修志稿件，打造开放式的编纂网络共同体，把中华大地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的火热实践和个体经验转化成生动深刻的志书采编对象。例如，杭州市桐庐县的“微村志”编修即面向大众开放网络供稿端口，引导高校、地方研究机构、退休老同志、新闻记者、大学生村官等各方人士共同完成村志的采写编修。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的 Family Search 亦具借鉴意义，该数据库面向全球免费开放，用户注册后即可在线编写、添加个人的家族图谱。只有丰富志书资料的供给链条，营造立体编纂的空间，才可能在新征程上绘就现代方志的新图景。

（三）丰富志书记述底色

第二轮市县志书的篇目和各级党政机关的职能运行有清晰的对应关系，记述多从行政工作角度出发，采用综括提要的写法，昭示着国家权力的地方治理模式。鲜明的“政书”书写模式下，部分志书撰述的比例尺往往较小，长于勾勒全局而疏于细节填充，着眼提炼主脉而忽视枝叶映衬，对时代动感和千妍万态的人事缺乏深切感知，诚如王熹所言：“部门资料带有明显的管理工作痕迹，不能全面反映改革开放的真实情况和发展进程。”^①为此，浙江市县第二轮志书主要在民生记述和设立专记两个方面尝试改善，但前者的多数资料仍然来自政府部门，部分表达仍未脱官方视角；而后者的使用极易突破编纂规范，个别志书设置专记数量达数十个，显然有失允妥。如何在体例体裁层面做出更多、更好的尝试，补充加强志书中典型事例的记载，以宏观叙述彰明发展主题，以典型细节完成时代注解，通过点面结合的编纂结构丰富志书的记述底色，是第二轮修志阐之未尽而需要第三轮修志继续探索的课题。

例如，口述资料不仅在“复活”历史原生态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而且重视从个

^① 王熹：《论口述历史资料与二轮方志纂修》，《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

体视角体察和认知历史，可以补充讲述许多以往宏大叙事框架中被忽视的“毛细管”和“横切面”，满足志书编纂关注史实具象和大众感受的需求。社会调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它触及社会热点、难点、痛点问题，描述状况、解析原因、预判前景，完成历史现象的“深描”。浙江市县第二轮修志过程中，口述资料和社会调查已初露端倪，《海盐县志》和《义乌市志》围绕步鑫生与海盐衬衫总厂、敲帮糖到小商品市场的转型进行口述访谈；《萧山市志》则通过“口述萧山史”项目课题，完成近100万字规模的市志单卷本；也有个别地区将口述资料和调查报告置于专记、丛录以及附录之中。虽然这些努力还未产生规模效应，但已颇具研判价值和启示意义。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国内社会调查领域里程碑作品的费孝通《江村经济》，也是一部乡土志书。因而，在第三轮修志中，可以尝试选择伟大事业征程和重大历史变革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和地区，进行定点、定量的个案研究，以客观真实的数据统计和具体生动的实例分析，将共同富裕的辉煌成就写入志书。

女性群体记述也是需要重点商榷的问题。众所周知，旧志多从父权制和礼学教化出发，以男性规训视角下的“贞孝节烈”对理想女性进行形塑和彰显。社会主义时期两轮修志，虽然革除了性别偏见，但对于女性群体的关注反不如旧志充分和集中。以浙江为例，新方志中女性入志标准缺失，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得不到较好展现，就业、养老、婚育、子女教育、家庭暴力、性别歧视等社会困局中引发广泛关注的女性问题在市县第二轮志书记述中均未作答。第三轮修志有必要正视性别关系，依托妇联、妇女委员会以及各类妇女研究机构梳理相关史料，从妇女权益、性别史等视角检视新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发展，引入女性群体形象，编纂女性专志，让广大女性通过志书“看见”自己，真正让地方志书成为两性平等对读的新式文本。

结 语

从浙江实践来看，第二轮修志巩固和拓展了首轮奠定的事业基础，明晰了修志模式，在打造志书编纂特色方面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和做法，通过讲述风雨兼程的发展故事，深刻演绎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但在第三轮修志的进路上，地方志书需要重绎历史定位，把握发展变量。实践证明，一部志书有多大价值，并非由自己来评判，而是取决于党和政府、人民群众的认可度，第三轮修志要以思路拓宽出路，将闭门修志转变为与社会密切结合的开放系统；要以格局开创新局，主动拥抱“数字修志”这一关键发展变量；要以作为争取地位，打造富有吸引力、可读可感的精品佳志，让方志编纂的悠久传承在现代社会中“活”起来，真正做到见人、见物、见生活，使越来越多的读者从方志中感悟历史和时代的旋律。

（作者单位：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